

黄朴民
解 读

孙子兵法

HUANGPUMIN JIEDU
SUNZI BINGFA

岳麓书社

黄朴民

解
读

孙子兵法

HUANGPUMIN JIEDU
SUNZI BINGFA

黄朴民 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朴民解读孙子兵法/黄朴民撰. —长沙:岳麓书社,2010

ISBN 978 - 7 - 80761 - 524 - 8

I. 黄... II. 黄... III. ①兵法—中国—古代
②孙子兵法—译文③孙子兵法—注释 IV. E8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748 号

黄朴民解读孙子兵法

撰 者:黄朴民

责任编辑:彭卫才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2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978 - 7 - 80761 - 524 - 8/K · 289

定价:18.00 元

承印: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出自中国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许多合理内核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泽，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已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第一节 孙武其人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又被尊称为孙子或孙武子，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或说山东博兴、山东广饶）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大约与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时而略晚。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齐国度过的。据史书记载，孙武的祖先

为陈国公子完。公元前 672 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因避祸而逃奔到齐国，被齐桓公授予“工正”（管理手工业的官员）一职，后改称田氏。通过多年经营，田氏家族在齐国站住了脚跟，势力不断壮大，成为齐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田完的五世孙田书，曾奉齐景公之命，率军攻打莒国，立有战功。田书班师后，齐景公对其大加封赏，“赐姓孙氏”，并把乐安封给田书，作为他的采邑。这位战将田书，据说就是孙武的祖父。

孙武从小成长于这样一个欣欣向荣且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父辈的教育督促之下，他开始接触兵学，这为日后参与战争实践、著述兵书、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正》等典籍的记载，孙武在齐生活期间，齐国政坛上发生了“田、鲍四族谋为乱”的重大变故。孙武不愿置身于这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于是萌生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的念头，他反复考虑选择的结果，就是作出了南下吴国，以求一展抱负的决定，这大约是在公元前 520 年左右。

孙武辗转来到吴国之后，在吴国都城（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附近定居下来。在那里，孙武一面灌园种田，过着隐居生活；一面研读兵书，撰写兵法，冷静观察吴国的政治动向，等待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时机。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公元前 515 年，吴国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战功卓著、韬略过人、素孚众望的公子光指使勇士专诸在家宴上刺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经军讲武，“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廩，治兵库”，积极从事对楚的战略决战准备。为此他广揽人才，起用贤士，以求“折冲销敌”，实现自己战胜强楚，争霸天下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伍子胥的大力举荐，“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的孙武终于脱颖而出，走上风云变幻的历史

舞台。

孙武出山后，应召携带他的兵法十三篇赴吴宫晋见阖闾。在那里，孙武向阖闾呈上了自己的兵法。阖闾怀着浓厚的兴趣将它们阅读一遍，连连称妙，孙武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到的见解，引起了一心图霸的阖闾的共鸣，为自己终于找到一位杰出的将才而深感庆幸。但同时阖闾还希望看到兵法十三篇的实战效益，便对孙武说：“您能不能对您的兵法作一次小型的操演呢？”

孙武给了阖闾一个肯定性的回答，于是就在吴宫中用一百八十名宫女当着阖闾的面进行操练。在这次操练教战过程中，孙武为了严肃军纪，体现信赏明罚、“以法治军”的精神，同时也为了申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指挥原则，处死了两名担任正副队长但却藐视将令不遵守军训纪律的吴王宠姬，从而使这次军事操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虽然阖闾对孙武处死自己的两名宠姬感到不快，但他毕竟是个有作为的君主，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反而从内心深处加深了对孙武将才的认识，于是果断地任命孙武为将军，担当起军国重任。

孙武为将后，参加指挥吴伐徐国和钟吾国的作战，并很快灭掉了这两个小国，剪除楚的羽翼，为吴国下一步伐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然，此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阖闾出于速胜心理提出大举攻楚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不过孙武并不是消极地守株待兔，而是积极运用谋略，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运用“疲楚误楚”的策略方针，把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使其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麻痹对手，诱使其发生判断错误，松懈必要的警惕。在这一策略方针的实施过程中，孙武作为吴军的统帅之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以致命一击的时机成熟了。这一年的冬

天，吴王阖闾御驾亲征，委任孙武、伍子胥、伯嚭等人为将军，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水陆兵力三万余人，并联合唐、蔡两国，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及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大胆的战略奇袭，从而揭开了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柏举之战的帷幕。这场战争的战略目标是孙武等人预先制订的，它以袭占楚国郢都为目的，以实施远距离战略袭击为作战方针。

在这场战争中，吴军遵循孙武“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和“以迂为直”的作战指导思想，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信阳一带），挺进到汉水东岸，迫使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

当两军接触后，吴军即采取了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对策，在小别（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与楚军进行周旋，屡次挫败楚军的兵锋，造成其军队疲惫，士气低落。然后孙武等人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在今湖北麻城一带）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间，柏举决战爆发，吴军在阖闾、夫概、孙武等人指挥下，奋勇拚杀，大破楚军，取得会战的决定性胜利。

楚军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孙武等人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终于先后在清发水（即淝水，今湖北安陆西）、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等地追及楚军，给楚军残部以多次沉重打击。至此，楚军全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孙武等人挥师挺进，直捣郢都。楚昭王见大势尽去，仓皇出奔。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底一举攻克郢都，柏举之战终于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柏举之战是孙武亲自参与指挥的最重要的一次战争。它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经此一战，孙武作为伟大的军事家从此名闻遐迩。其战略战术思想，如

“兵者诡道”“上兵伐谋”“避实击虚”“兵闻拙速”“以迂为直”“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造势任势”等等，均在此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应该说，孙武本人在柏举之战中的杰出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柏举之战后，孙武继续辅佐阖闾的事业，曾在对越国作战中发挥过作用，因此司马迁称誉他和伍子胥一起为吴国“南服越人”作出了贡献。十年之后，吴王阖闾在同越国的战争中负伤身死，其子夫差继位，孙武又继续辅佐夫差。吴军在公元前484年的艾陵之战中战胜齐国的军队。到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之后，吴国终于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在这些活动中，孙武有可能起过一定的作用，所以司马迁说：“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的晚年情况史载不详，很有可能是有鉴于吴王夫差骄横好战，以及好友伍子胥被迫自杀等情况，而激流勇退，飘然高隐。所幸的是，他身后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

第二节 《孙子兵法》成书的历史契机

司马迁在《孙子本传》中说，孙武之所以“显名诸侯”，名于当世，是因为他辅佐阖闾“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然而，在今天，孙武之所以在军事史上享誉中外，名播千秋，则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虽然只有六千字左右，但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它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及详备富赡的内容，书中充满了对智慧的赞扬，包含着对昏聩的鞭挞，显示出对穷兵黩武的警告，贯穿着对军事哲理的探索。这是一部从战略高度论述军事问题的不朽之作。

那么，为什么在东方，在中国，在两千五百年前能够产生《孙子兵法》这样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我们认为，社会文明的演进，

战争方式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激荡，地域文化的孕育，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个人实践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就是《孙子兵法》诞生的历史契机。

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历史上贵族分封制向君主集权制过渡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向腐朽没落的贵族领主阶级展开斗争。其中在政治领域内，战争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他们为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都高度重视对战争经验的总结，急切需要为本阶级的军事学家为自己提供从事战争实践的理论指导。从这层意义上说，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时代的要求。

尽管诸侯列国都在研究战争，培养军事人才，但是相形之下，哺育孙武成长的故土——齐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它最终成为培育一代兵圣的摇篮。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境内，具有悠久的历史。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立国伊始，即推行正确的治国方针，奠定了齐国长期强盛的基础。而齐国开放、发达的社会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文化具有注重实用和兼融博取的两大突出特点。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因此它在齐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姜太公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辅佐周武王剪灭商朝，在战争实践方面功业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太公兵法》虽早已失传，但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它的核心是“多兵权与奇计”，因而“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而作为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司马兵法”的发明与总结，也与姜太公和齐国兵家有直接关系。《李卫公问对》卷上载：“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由此可见，他是中国历史上军事理论建设的重要奠基者。

姜太公初步确立的齐国兵学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条件的变革而得以弘扬和光大。由于各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

当时诸侯列国中相对比较弱小。所谓“齐兵素号为怯”，“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就是例证。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重兵学理论方面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著名的军事家在齐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精彩的军事理论著作也纷纷面世。在春秋战国之际，出自齐人之手的兵法著作除《孙子兵法》外，还有《管子》《司马法》《六韬》《孙臆兵法》《子晚子》（今佚）等等。这表明，兵学是齐国整个学术文化体系中极具特色、富有影响的重要构成部分。《李卫公问对》卷上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这充分显示出齐国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换言之，没有齐国兵学，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中国古典兵学。这样的兵法之国的特殊环境，对于孙武创作《孙子兵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孙子所出身的田氏家族是一个具有深厚渊源的军事世家。这一优越条件，对于他撰《孙子兵法》的意义也不可低估。因为，家族内部专门学问的累代相传，乃是当时学问传授的主要方式，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况叫做“家学”。比如，赵括熟读其父赵奢的兵书；苏代、苏厉学习其兄苏秦的纵横之术；甘罗继续其祖父甘茂的谋略，都是家学代代相传的史例。孙武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孙臆兵法·陈忌问垒》所附残简中提到的“孙氏之道”是“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就说明两种《孙子》本系一家之学。所以我们讲，在这样的军事世家中成长起来的孙武，耳濡目染，感化挹注，自然具备了最好的学习条件和创作基础。军事世家对于《孙子兵法》的诞生，其意义正在这里。

孙武能够写出不朽的兵法著作，和他个人积极投身军事实践活动这一经历有关。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孙武在吴国参与了大量的

军政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这就为他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他亲身参与指挥破楚入郢之战，从中总结归纳出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这对于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兵学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还需要指出的是，孙武迁居吴国之后，曾同出身楚国贵族、深富韬略的伍子胥过从甚密，切磋学术，这无疑使他间接地增加了对以吴楚为代表的南方军事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从而使《孙子兵法》彻底摆脱“古者《司马兵法》”的窠臼，成为反映当时社会新要求，更准确地体现军事斗争自身规律特点的划时代兵学经典。

同时，孙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天赋，更在于他自己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孜孜不倦，永不停顿。这既表现为他善于借鉴、吸取前代典籍中所反映的战争经验，也表现为他善于根据新的情况，修改、充实自己的兵学理论。在《孙子兵法》中，对吴楚战争经验的总结，就表现为这方面的痕迹。我们知道，孙武向阖闾呈献十三篇时柏举之战还没有发生，但《孙子兵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凡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很可能是孙武对于吴军破楚入郢之后，“不修其功”，导致失败这一教训的深刻反省。又《作战篇》中讲到：“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这恐怕也是对夫差放松对世仇越国的警惕，举兵北上，争当盟主，而导致越国乘隙进攻，亡国破军历史悲剧的总结。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孙武为了使自己的兵学理论更深刻、更完善，曾经孜孜以求，惨淡经营，这或许也是《孙子兵法》之所以成功的奥秘所在。

《孙子兵法》的诞生，也是先秦兵学自身嬗变的客观结果。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先后显示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递的阶段性特色，《孙子兵法》的成书，是其中第三个阶段登场的主要标志。在它之前，已有两个阶段先后出现。这一是以甲骨卜辞以及《周易》为代表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阶段。它借

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们相对直观、肤浅甚至臆断的军事认识。

二是以“古司马兵法”（含《军志》《军政》《令典》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与初步发达阶段，也即以“军法”为主体的阶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学，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军法”与“兵法”的区分，按李零先生的观点，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作战指挥之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与操典的性质，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由于它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一阶段兵学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服而舍人”；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所总结揭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整个战争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反映贵族分封制社会军事礼乐文明的“军法”“军礼”传统渐渐趋于式微，而代表新兴势力兵学诉求的“兵法”则蓬勃兴起，成为军事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该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军事思想摆脱“军礼”的束缚，对过去那种“鸣鼓而战”的堂堂之阵战法予以了坚决的否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更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对此，东汉班固也曾有过洗练而准确的揭示：“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而孙武撰著《孙子

兵法》，正是“兵法”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最显著标志。

但是，“军法”的存在，毕竟为孙武构筑其兵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汲取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换言之，《孙子兵法》之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继承与扬弃，这不仅仅体现为兵学原则的全面归纳和总结，而且也反映为文字语言的广泛袭用转引。《孙子兵法》中所谓“用兵之法”“法曰”等内容，实际上就是已佚上古兵学著作的基本条文，既“述”且“作”乃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对此，笔者曾在《从〈文选注〉看〈孙子〉成书的渊源》一文中详加考论，指出孙武在撰著《孙子兵法》过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内容（文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第15辑）。这种引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明注出处，如《军争篇》所云：“《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等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征引，如《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文照录，如《文选》李善注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诡道，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火攻有五”“始如处女”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军争篇》曹操注引《司马法》：“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这在《孙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炼为“围师必阙”四字。情况虽然各式各样，但是，孙子撰写《孙子兵法》有丰富的前人兵学著作可以参考借助，因藉汲取乃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既是孙武本人的天才创造，也是前人兵学智慧的浓缩总结。

孙武撰写《孙子兵法》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还应该到战争内在发展趋势和社会思潮演进轨迹中寻找。换句话说，孙子兵学的诞生乃是战争自身发展的逻辑归宿，社会思潮嬗变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诸多条件和各种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毫无疑义便是战争实践本身。这意味着，自上古到春秋末年次数频繁、程度激烈、空间宽广、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乃是孙武撰写《孙子兵法》、构筑其兵学体系的动力之一。

春秋中晚期，由于“国”“野”畛域的渐渐泯灭，军队数额的剧增，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与戎狄族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得以重新崛起，步战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从春秋开始，水军初步得到发展，水战在南方地区逐渐流行。而商代萌芽的单骑，到春秋晚期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这样就更加推动了战争方式的日趋复杂。另外，在当时的战争中，除了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外，城邑攻守、要塞争夺、伏击包围、迂回奇袭等战法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就当时的战争指导而言，一些战争指导者也开始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加以结合，并重视运用谋略，强调争取盟国，注重巧妙用兵，加强军队建设，提倡用间惑敌，从而使战争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气象。可见战争发展到孙武所处的春秋晚期，已经完成了从幼稚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运动过程。其总趋势就是：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战争的样式日趋复杂，战争的程度日趋激烈，战争的次数日趋频繁，战争的意义日趋明确，战争的结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日趋深远。

战争历史的悠久长远，战争经验教训的丰富深刻，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战争意义的鲜明突出，一句话，战争的丰富实践，到春秋晚期业已为兵学家系统构筑军事理论、指导战争实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换言之，时代已经伸开了巨臂，准备接受一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投向它的怀抱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孙武勇敢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睿智地承担了光荣的使命。他立足现实，回溯以往，瞻望未来，原于战争，高于战

争，终于向历史递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孙子兵法》。

同时，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成熟与完善，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总体发展演化，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孙武写就《孙子兵法》，战争固然是直接的动力之一，然而古代社会思潮的逻辑发展，同样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兵法》不过是整个人类思维理性进化过程作用于军事文化领域的产物，是古代思想发展长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发展到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已呈现出新的风貌。具体地说，它正以新颖的思维方式、贴切的理论命题、敏锐的历史触觉，对以往进行总结，对现实进行指导，对未来进行展望。它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就在于它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条件，成为中国古代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春秋时期哲学、政治思潮的时代特色，在我们今天看来，主要反映为：①以初步否定天命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思潮的勃兴；②以努力揭示事物运动规律为宗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崛起；③以重民尚德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的发展；④以改铸旧礼、弘扬仁义为基本特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演进。而这些时代特色，在孙武撰写其兵学著作时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渗透和影响。这充分表明，假如没有当时社会思潮总体演进，《孙子兵法》就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孙武的成功，完全在于他的兵学体系构建始终与时代思潮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历史的契机在《孙子兵法》上所打下的深深烙印。

第三节 《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曾有分歧的意见，

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臆？抑或如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①？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孙子》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它的作者也难以肯定是孙武，而当为其门人或再传弟子。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孙臆^②。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臆的记载相吻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臆各有其人，《孙子》的作者不是孙臆。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③。

我们认为，《孙子》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

② 参见齐思和：《孙了兵法著作时代考》，载《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李丕基：《孙子十三篇释疑》，《新东方》第2卷第3期；钱穆：《孙武辨》，载《先秦诸子系年》（增订本），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参见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载《文史》第7辑；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收入氏著《竹简帛书论文集》等文。

1. 孙武曾著有兵法，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 “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臧，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臧，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繚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内容基本相一致^①。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臧为一人，或以为《孙子》成书于孙臧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辞。因为仅凭借《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辨》中即有反驳。其要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

^① 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